



台港澳及海外中文报纸刊载
孙中山生平史料
及台报纪念特刊选集

《参考消息》编辑部编



《参考消息》专辑之二十四

台港澳和海外中文报刊刊载

孙中山生平史料

及台报纪念特刊选集

主 编：杨效农

责任编辑：李玉厚 刘茂俭



新华社《参考消息》编辑部

目 录

第一部分

孙中山与澳门.....	(1)
附一：孙中山在澳门活动遗迹.....	(3)
附二：澳门的中山纪念馆.....	(4)
孙中山先生与香港.....	(5)
国父在星洲.....	(7)
孙中山与新加坡.....	(11)
梅屋敷曾住伟人 今益增光彩.....	(13)
孙中山在英之革命活动.....	(15)
国父与英国——国父的四度访英及其英国友好.....	(19)
国父的人格与风范.....	(28)
孙中山逸闻数则.....	(49)
附：“中山”名字的由来.....	(52)
孙中山轶事.....	(52)
国父的读书生活.....	(54)
孙中山生平事迹简表.....	(55)
创办《镜海丛报》与费尔南德斯.....	(61)
中山先生怎样认识黄兴.....	(63)
孙中山与张静江之约.....	(66)
孙中山与陈嘉庚.....	(67)
孙中山赏识王云五.....	(69)
孙中山与卢夫人.....	(70)
手足情深.....	(74)
国父直系后裔今昔概况.....	(77)

第二部分

国父对引用外资的原则阐述.....	(82)
国际化对中外合作投资的展望.....	(87)
引进外资、外才发展高科技工业的现况及展望.....	(91)
当前外人投资的现况.....	(95)
自由民主是我们生死依存之岛.....	(98)
中山先生的建国思想与台湾的经济发展	(102)

第一部分

孙中山与澳门

△孙中山父亲孙达成，年青时在澳门学过裁缝，在板樟堂街一间外国人开设的鞋店当工匠。孙中山自小曾随父兄来往家乡与澳门之间。

△一八七八年五月，年仅十二岁的孙中山随母亲第一次出国往檀香山，是从家乡翠亨村抵澳，然后坐船往港，大开眼界。他后来自述：“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

△一八八三年，孙中山再次往港读书，又从家乡抵澳，乘船往港。

△一八八七年起，五年间，孙中山在港攻读医科大学，课余常往来港澳间，与陈少白、尤列、杨鹤龄往来密切，被称为“四大寇”。在澳时，常往杨鹤龄设在水坑尾巷十四号的“杨四寇堂”、“大放厥词”，提出“勿敬朝廷”的口号。

△一八九二年，孙中山在澳门报刊发表《致郑藻如书》，这是孙中山在一八九〇年左右写给香山籍的退职官吏郑藻如的，郑以“通时务”著称。孙中山在书信中呼吁效法西方，进行社会改革，主张兴办农桑、禁绝鸦片和普及教育，在香山县实行后再向各地推广。

△一八九二年七月，孙中山以“最优异”成绩毕业于香港西医学院（即今香港大学医学院前身），旋于九月到澳门镜湖医院担任义务医席，开创镜湖医院西医之先河。孙中山医术精明，行医“不满两三个月，声名鹊起，……就诊者户限为穿。”

△一八九二年十二月，孙中山两次向镜湖医院借款，共三千一百六十八两，在草堆街八十至八十四号，开设“中西药局”。孙中山在镜湖医院义务行医，由“中西药局”免费供应西药作为支付向医院借款的利息，生意颇佳。

△一八九三年春，孙中山托在香港时认识的葡人费尔南德斯向澳门政府申领西医牌，由于不是在葡国医科毕业，未能领到牌照，结果受葡籍医生排挤，改赴广州行医，但“中西药局”仍继续开办，孙中山也仍常往来澳穗之间。

△一八九三年七月，孙中山与葡籍友人费尔南德斯合作，出版中文周刊《镜海丛报》，孙中山当匿名编辑和主笔，发表革命言论。孙中山在广州开设的医务分所“双门底圣教书楼”，以及在香山县石岐开设的“西门外中西药局”，均为《镜海丛报》的十七个“代派报处”之一。

△一八九四年，孙中山在一八九一年前后写的两篇论文《农功》和《商战》，由郑观应以“孙翠溪”笔名，收录进三月编印的《盛世危言》内。从一八八六年到一八九〇年，郑观应在澳门的祖居“郑家大屋”居住。孙中山在大学读书时已认识郑观应，其后交游甚密。一八九四年孙中山从上海经日本抵檀香山，是靠郑观应设法代领出国护照。

△一八九四年二月，孙中山因事由穗回澳度岁，二月底才往穗“东西药局”开诊。在此之前，则在家乡翠亨村和澳门，草拟上书直隶总督李鸿章，至同年六月抵津投书李鸿章。

△一八九五年十月，孙中山在广州策划首次武装起义未及发难即遭失败，十月二十七日晚上乘船逃出广州，经唐家湾到澳门，找到葡人好友费尔南德斯，获悉清政府已通知澳门政府通缉孙中山，费尔南德斯为助孙中山脱险，即陪同孙中山坐船抵港，孙中山旋于翌日转往日本。

△一九一二年五月底，孙中山偕同女儿等，由港抵澳逗留几天，下榻于“娱园”（其部分为今卢廉若公园）的春草堂，广泛会见中外各界人士，受到热烈欢迎，并分别与镜湖医院经理卢廉若以及一百多位中葡知名人士在娱园合照，费尔南德斯一家亦获接见。孙中山还曾到镜湖医院一游。稍后，于五月二十七日由澳返乡，这是孙中山阔别家乡十七年后首次也是最后一次返回故里。

△一九一三年六月，孙中山再次来澳，在军舰上会晤陈炯明，商谈“讨袁”事宜，促陈同意“四省独立，广东同时宣布”。此次回澳，孙中山还看望了病危在澳留医的长女孙婉。

△一九一五年，孙中山在澳定居的哥哥孙眉，于二月十一日在澳门病逝，孙中山因在日本未及返澳奔丧而悲恸。

△一九一五年春，获得孙中山支持的飞行家谭德根，架机来澳筹款，在黑沙环海傍举行本澳首次飞行表演，轰动全澳。谭德根于一九一四年被孙中山委任为中华革命军飞机队队长。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日，孙中山又函嘱南洋同志资助谭德根开办飞行学校。

△一九一四年至一六年，孙中山委托得力助手朱执信来澳门策划“讨袁运动”，朱执信曾在几年间多次来澳，策划筹款，买军火，印传单等工作。

△一九一九年，粤军决定回师，孙中山着孙科回澳门以特派员名义成立办事处，号召在粤海陆军起义响应。孙科在澳门鹅眉街十号设办事处，接洽各方面派来的代表，并多次传达孙中山催促广东各部队发动起义的意见。

△一九二〇年六月初，孙中山特电在澳门策划起义的孙科，催促广东省内各部分革命队伍先行发动起义。七月十五日，江大舰起义，从广州驶抵澳门被发觉，在路环九澳湾搁浅。是次起义终因对敌麻痹、措施不周而失败。

△一九二一年，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聘请当时在澳门定居的杨鹤龄（“四大寇”之一）为总统府顾问。一九二三年又委派杨鹤龄为“港澳特务调查员”。

△一九二一年十月二日，孙中山为澳门葡兵越界枪击中国军队并在事后拒绝广州政府的抗议事，饬令海军派军舰前往澳门近海警戒。

△一九二二年六月二日，孙中山接见澳门工会代表，支持他们在澳门“五·二九事件”中反抗葡兵枪杀华工的斗争，次日，广州政府向澳门葡萄牙当局提出最后警告，并派陆军和炮舰赴前山一带。

△一九二三年二月五日，对孙中山革命鼎力支持的兴中会值理邓荫南在澳门去世，孙中山闻耗后即发布明令：“邓荫南为国尽瘁，老而弥坚，今忽溘逝，殊深震悼。邓荫南着授陆军上将，并给银一千元治丧，所有应行议恤事宜，大局底定即由陆军从优拟议。”一九二四年十月，在孙中山的关照下，人们将邓荫南的遗体，从澳门运回广州，葬在今先烈路青龙坊口。

（原载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澳门日报》）

附一：孙中山在澳门活动遗迹

本澳当年与孙中山先生有关的遗迹有多少处呢？据悉有如下多处：

（一）镜湖医院孙中山行医之处。一八九二年九月，孙中山在香港大学毕业后来澳，出任镜湖医院的义务西医，开创镜湖医院西医的先

河，孙中山成为本澳首位华人西医。孙中山于一九一二年五月下旬曾重游镜湖医院。

(二) 草堆街八十四号，当年的“中西药局”，现今的“大生匹头”店。“中西药局”是孙中山在镜湖医院行医时，向“镜湖药局”借款两笔所创，用以施赠西药给在镜湖诊治的病人。

(三) 下环正街三号，是中山先生当年在澳门创办的《镜海丛报》社址，创办日期是清光绪十九年六月初七日（即一八九三年七月十八日），采周报形式，每逢星期二出版。版别则分中文及葡文两种；葡文版的名称叫《Echo Macaense》（《澳门回声》），每期出纸一大张。中文版《镜海丛报》东主兼督印人的署名虽是飞南弟，但可以相信，其主持者及编辑者却非飞南弟而是孙中山。

(四) 水坑尾巷十四号，当年的“杨四寇堂”，前几年拆卸重建。“杨四寇堂”为“四大寇”之一的杨鹤龄的居所，名字由杨自己命名。“四大寇”指孙中山、尤列、陈少白、杨鹤龄四人。他们经常聚会于“杨四寇堂”活动，成为革命的策源地之一。

(五) 卢廉若花园“春草堂”，昔日为“娱园”内的建筑物。一九一二年五月下旬，孙中山由港经澳重返家乡翠亨村，在澳逗留期间，曾以贵宾身份受园主卢廉若之邀，下榻该处，并在该园内接见中葡人士等欢迎者。

以上五处，为与孙中山直接关系的澳门遗迹。

（原载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澳门日报》）

附二：澳门的中山纪念馆

澳门的“国父纪念馆”，座落文第士街上，是一幢三层高五开间的西式建筑，落成于一九三二年。这是昔日有名的孙府，原是一座较低矮、简陋的中式二层砖房，由孙中山的胞兄孙眉斥资兴建，于一九一八年落成，作为孙中山德配卢太夫人的寓所，孙科亦曾作居停。

一九三〇年八月十三日凌晨五时，兵头花园后方的军火储藏库，由于天气酷热而突然爆炸，酿成巨灾。位于其附近的“孙府”也被殃及，墙壁破裂，门窗损毁无数。据说当时卢太夫人适在其内，幸得当时澳门

著名的建筑商何光来开车来救，始免危险。及后，澳葡当局给予一笔赔偿，“孙府”便由何光来承建，遂成今日的样子。

重建后的“孙府”，面貌、结构与昔日截然不同，形式典雅庄严，外形优美、对称，外绕以短墙，左侧辟连一个小花园，内竖孙中山先生的全身铜像，该铜像由孙中山生前日籍好友柏屋庄吉所铸赠。

几十年来，“孙府”外貌依然。卢太夫人于一九五二年九月七日病逝后，“孙府”于一九五八年四月开放为纪念馆。

（原载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澳门日报》）

孙中山先生与香港

“香港是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发源地，也是辛亥革命的摇篮，一八八三年至一八九二年，孙氏在港前后接受高中和大学教育达七年半，是他早期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在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里，该校历史系主任伦霓霞博士向记者谈到了孙中山先生与香港的关系。

伦博士是香港孙中山先生研究学者，早年毕业于香港大学，后留学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获博士学位，七十年代初返港在中文大学历史系任教，一九七六年她开始从事孙中山先生与香港关系的研究，今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她与广州中山大学陈锡祺、陈胜彝等教授合作编撰了《孙中山在港澳与海外活动史迹》一书，最近又忙着筹备了中文大学与中山大学合办的“孙中山先生生平事迹展览”。伦博士说，“孙中山把一八八五年视为他革命思想的起点，他在《孙文学说》中指出：‘予自己酉（一八八五年）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而此时，他正在香港求学。”

孙中山离乡来港入学时已十八岁，先在拔萃书室及中央书院就读，后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中央书院是香港第一所官立中学，校长及不少教员均来自英国著名大学，思想比较开放。该书院的课程及授课方式，有助于孙中山对西方科学、社会及政治制度的认识，特别是英国国会的发展，王权与人民斗争，十九世纪欧洲的革命等。加上当时香港的言论较自由，报章书刊的熏陶，使他更加了解清廷的落后和腐败。对他思想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中法战争。当时清廷腐败无能，但在香港，却发生

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杯葛法国人，使孙中山看到“中国人民已经有相当觉悟”、“中国不是没有办法的”；同时痛感不改革中国政治，中国就会灭亡。

一八八七年十月，香港议政局议员、律师兼医生何启参与创办了西医书院，这是一所较完善的医科大学，孙中山在这里就读五年间，与一批爱国青年欢谈革命，其中有陈少白、杨鹤龄、尤列等。孙中山曾回忆说：“予与陈、尤、杨三人常住香港，听夕往还”，“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故港澳间之戚友交游，皆呼予等为‘四大寇’，此为予革命言论之时代也。”他还结识了“辅仁文社”杨衢云、谢缵泰等一班青年，该社的格言是“尽心爱国”，提倡“开通民智”。与此同时，他也认识了不少改良主义者，他一方面与陈、杨等“高谈反清”；一方面上书郑藻如，并与郑观应谈论农学，后来又上书李鸿章，希望能通过改良之道，拯救中国。但上书李鸿章并无结果，如上甲午战败，这对孙中山选择革命之路有决定性的影响。

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孙中山到夏威夷正式创立革命团体兴中会，其成员不少曾在中央书院就读。三个月后，他回港与杨衢云、郑士良、陈少白、尤列等组织香港兴中会，成立后不到一个月，他便以这个团体为核心，计划起义行动。

兴中会和同盟会曾以香港为基地先后策划内地八次起义。一八八五年十月的广州起义是孙中山在香港亲自组织的，第二次会议决定将香港作为人员、武器和资金集中地，重阳节进入广州城，由何启起草宣言。最后一次会议在杏花楼举行，厘定了临时政府的政策大纲。广州起义失败后，清廷通过英殖民地部向港府提出禁止革命分子在港活动甚至要求引渡。孙中山在港不能立足，远赴日本、檀香山，及至一九〇二年港府下的驱逐令期满，孙中山经港赴越南时才在永乐街《中国日报》社下榻住了几天。

一九一二年他辞去临时大总统后，亦曾抵港澳会晤各界人士。一九二三年二月，孙中山由沪抵港，准备回广州重建革命政权，抵港后曾拜会港督，并应香港大学学生会之邀在港大礼堂发表演讲，指出他的革命思想的来源地是在香港。孙中山最后一次到港是一九二四年十一月，由穗经港北上京津，在邮船《春洋》号上与各界人士见面。

伦博士强调，一八九五年前后孙中山的反清活动，是他一生政治生

涯中一个关键时期，香港的社会、学校教育、书报读物和言论比较自由的环境，使他能作比较广阔的观察，从个人思索开始，进而结友谈论、联络、组织革命团体，进行革命起义，“从此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加之香港与广州及广东南部交通便利，给革命分子偷运武器、收集及支付革命经费、集会及起义失败后匿居提供了条件。

伦博士认为，值得高兴的是当时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支持者包括了香港各界人士，其中不少是富商子弟，他们都本着爱国及对中国的关心支持革命活动。

（原载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三日泰国《星暹日报》）

国父在星洲

“只有绝顶伟大的人物，才会有他那种特有的伟大襟怀，和悲天下悯万民的伟大爱心，也才能创办无比的伟大事业。”这是新加坡“孔教会”会长蔡多华者先生子十多年前亲口告诉作者的一句话。

蔡老先生所指的伟大人物不是别人，是指我们的伟大国父孙中山先生而言的。因为蔡老先生讲这段话时，正是作者询问他有关国父在新加坡的一些早年事迹而提及的。

作者于一九六七年五月到新加坡的南洋大学任教，直到一九七九年八月才返国来。其间认识了一位青年晚辈，名叫曾昭谷。有一次我向他打听有关《新加坡中兴日报》的史迹，他说：“我知道得有限，我带你去请教一位老先生吧。”就这样，我们去拜访了“新加坡孔教会”的会长蔡多华老先生。

因为打听《中兴日报》的有关事迹，却从蔡老先生口中附带地知道了许多有关国父与新加坡的史实。那是一九七一年的八月间，蔡老先生时年八十一高龄，象一般健康的老年人一样，蔡老先生清晰地回想着他的少年往事，不时地还翻检着他在年轻时随手笔记的手册。

“以目前来说，关于国父……”他象沉入睡梦中似地，缓缓地合上双眼，全神贯注地回想着说：“在新加坡，恐怕只有我知道得比较多一点儿了，因为，那实在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蔡老先生说：“从前，我们那个年代，交通比较不方便，从新加坡

到国内，只靠航船，速度慢，往返也艰苦，从新加坡到香港、广州要三四天。所以，国父初期策划革命，根本没有到新加坡来。当时，研商推翻满清的计划，聚集同志会商的地点，早期都在广州、香港，偶尔也在上海。后来，国父被满清政府通缉，悬出高额赏银，国内和香港都无法立足了，才改变策划地点，利用日本和台湾。一九〇〇年十月革命军惠州起义失败之后，香港政府接受满清政府的通令，决定五年之内国父不准进入香港。在一九〇二年趁香港政府不备，国父去了一趟香港之后，急速离开香港，第二站就到了安南（今称越南）。在安南首都河内成立了兴中会的分会。安南距新加坡较近，所以革命风气后来慢慢地传到新加坡的华人社会中。

“一九〇五年冬季，国父在西贡募集革命资金之后，乘船转往法国。同船通到清廷驻法公使馆的商务随员张静江先生，张先生自谓多年经商，积资甚巨，明告国父十分同情革命大业，如日后军饷弹药需要用钱，只须一通电报，便可无条件通借巨款。后来国父真的多次向张静江先生求援，所得援助资金先后数次，总数达六七万大洋之巨。一九〇六年，国父自法国遍历欧洲备国，于四月间自欧洲航行到新加坡，在我的印象中，那似乎是他第一次为革命大业西来新加坡，当时我还是一位十六岁的少年，对国父的革命理想感到很大的兴趣。

“我们家是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笃信孔孟思想学说，就这一所‘孔教会’来说，就是我家独资兴建的，到如今已超过一百二十年了。国父所提倡的三民主义，竭力提倡民族主义，推崇孔孟儒家学说，家父特别欣慕国父的主张，所以我以少年无知之身，也有缘亲炙这位伟人。

“记得国父、梁启超、康有为都在我们这个孔教会住过，国父第一次到新加坡来之后，在孔教会住过两夜。后来有同志捐献出一幢别墅，在现在的大巴窑卫星镇附近，那条路名叫‘大人路’，现在那个别墅叫‘晚晴园’。国父于一九〇六年四月在‘晚晴园’安定下来以后，不久就在星洲组织了同盟会分会，一九〇八年再扩大为指挥会南洋的‘南洋支部’，而他本人则遍历吉隆坡、西贡、河内、槟榔屿、曼谷、仰光等东南亚大城去演讲鼓吹革命，从此在东南亚地区有了有力的资去供给来源。

“一九〇七年春季，清廷驻日公使杨枢要求日本政府驱逐当时正在日本计议革命的国父，但日本外务省私下认为国父将来必为东亚之巨

人，不愿开罪于他，于是在取得国父的谅解之下，不作官式的遣送出境处置，而只悄悄地赠给程仪五千日元，并为之设宴饯行，欢送以离日本。国父偕同胡汉民等人于一九〇七年三月离开日本，前往安南。不久后又南下到新加坡，在晚晴园住了几天，与许多同志计议训勉，才匆匆赶回安南。十二月，由国父亲自指挥在广西镇南关起兵，革命军攻占了镇南关炮台，高悬青天白日旗，血战七日后因无后援而败，但这一役给清廷以莫大的震惊，发觉安南竟是一个革命军的重要聚集地。于是清廷向法国政府提出紧迫要求，促令法国政府驱逐聚居安南的革命党人。国父首当其冲，不得已而离开了安南，而在东南亚各地往复奔波，其间多次居住新加坡的晚晴园，只留黄兴和胡汉民等人仍以安南为根据地，衡国父之命而继续在安南从事革命活动。

“一九〇八年三月间，国父坐镇新加坡晚晴园，策动黄兴发起第七次革命，由黄兴指挥两百多人从安南国境向广西钦州挺进，事前曾和清军统领郭人漳约好倒戈响应革命军，可惜未能实现，以致革命军在占领了几十个村落之后，终于解散失败。同年四月间，革命军再由安南国境向云南的河口进攻，而发动了第八次起义，清军管带黄元贞倒戈投顺，占领了河口炮台和南溪等地，但受到清军增援部队的强力压制，不得已而退入安南境内。以安南为据点发动几次义兵，法国方面的国境警备部队，对革命军不仅毫不干涉，甚且额手称庆；而在安南发行的报纸，也对革命军有许多正面的称赞。可惜的是：一九〇七年在武昌天主教圣公会中的革命组织‘日知会’被清廷查获，而且没收了会中的党员名册，于是清廷对法国加重压力，希望法国政府严禁河内的革命活动，因此，一九〇八年四月第八次起义的河口之役，当革命军败退入安南之后，法国政府不得已，将六百多的革命军全体解除武装，并把他们拘留下来；不过，其处理方法还算是使用比较同情的手段，特地包了一艘轮船，将他们统统送往新加坡。当时，新加坡的英国当局认为革命军就是乱民，因此不准进入境内；但法国政府则竭力主张‘实际上已经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而说服了英国，劝英国视他们为政治犯而准予入境。大体来说，新加坡殖民地当局的英国人，还算是相当同情革命军的。

“国父自从被河内的法国政府遣送到新加坡以后，暂时在星洲安顿下来，而河口之役的六百余壮士也都暂驻星岛；可是，这时清廷又在策划要将革命军从新加坡赶走，因此紧迫地命令驻星领事和英国提督交

涉，不过，那位提督根本不理睬这件事，却安然地让国父及革命军同志居留下去。自一九〇八年四月的第八次起义失败之后，革命军暂时停止了行动，国父则专意致力于在东南亚的扩大组织工作；就在过一年秋季，把新加坡的同盟会分会扩大加强，名之为‘南洋支部’，并派胡汉民为支部长，统辖整个东南亚的联络活动。而在此时，全东南亚已设了二十个分会，同志也超过了三千人。”

蔡老先生想了一想又说：“后来，在一九一〇年二月发动了第九次起义——‘广州新军之役’。这次的行动，是潜伏在广州新军内部的革命志士和警察之间，因偶然的冲突而爆发的，可惜革命军的支援未能及时衔接得上，而遭致失败。一九一〇年六月十日，国父从檀香山到横滨，消息被清廷得悉，日本政府受清廷外交上的压力，四处搜寻国父的居处，意欲遣送他出境，国父不得不在日本隐居了十五天，而于六月二十五日到新加坡支部，辗转到槟榔屿，集合了党内的主要人物黄兴、赵声、胡汉民、孙德彰、邓泽如等人举行会议，决定第十次起义的计划，这一役近代史上称之为‘黄花岗之役’，准备用经费十万元，首先以五百人在广州起事，占领广州之后，由黄兴率领一军出湖南，指向湖北；赵声率领一军进入江西，直趋南京。这是一个大规模的计划，也是连续多次起义以来的最后一次失败，继这次之后的第十一次起义——‘武昌起义’，革命也就成功了。

“其实，这在新加坡及槟城的筹划第十次起义，仍然遭遇许多的困难，原因是国父有一段演讲批评到英国的东南亚政策，被英国人指为‘扰乱马来亚治安’，因此，英国人明令驱逐国父，到了这步田地，亚洲地区已无国父容身之地了，于是只好重上征途，经由欧洲转向美国。在美国成立了‘洪门筹饷局’，筹措了许多的革命经费，第十次起义虽未成功，但给党人的激励之深，予清廷的打击之大，却是空前所未有的，也就因为如此，所以举国激愤，全民切齿，而促成了武昌之役的成功。”

在新加坡，于一九〇七年以后就有了鼓吹革命的党之喉舌——《中兴日报》，其后又办了《图南报》，在当地的华人社会中，起着领导性的舆论作用。

（摘自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台湾《青年日报》，作者：谢云飞）

孙中山与新加坡

今天，十一月十二日是孙中山先生的生日。新加坡今晚有两个机构为他举行纪念会：一为他生前在新加坡所创立的同德书报社，将在亚米年街旧址，举行一百二十一周年诞辰纪念。另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新加坡商务代表处，将在文华酒店举行一百二十周年诞辰纪念宴会，广邀各界代表观看有关孙先生事迹影片及图片展览。

同德书报社之称孙先生已一百二十一岁，与台北同样的算法。这是依华人传统习惯：一个人如在属鼠之甲子年十二月出生，一进入次年属牛之乙丑年正月，不足两月，却算两岁。依华族传统算法，孙先生的真寿，今年确为一百二十岁。

加依西洋足岁算法，今天实是孙先生诞辰的一百二十周年。北京乃依西洋足岁算法。

不管冥寿是一百二十岁抑或一百二十一岁，都与孙先生的人格无关。

新加坡对一百二十岁与一百二十一岁都有人纪念，这也显示出新加坡微妙的地方。

现在最值得令人高兴的现象，是全世界越来越多地方纪念孙中山，崇敬孙中山。而且纪念方式越来越隆重，花样越来越多。有几个影片机构，争以孙先生的事迹拍电影。他们敢于投下资金，乃相信敬仰的人多，观众一定多，当可以捞回成本，甚至赚钱。

我于一九八一年八月在南洋商报《商余》版发表了《新加坡对清末革命的贡献》一文中说到：

全世界华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在南洋，全南洋交通联络中心在新加坡。孙中山先生于英殖民地政府解禁后之一九〇六年来到新加坡，才找到强大的革命支援力量，才促成他实现革命初步目标。

他在辛亥革命之前，发动十次革命战役。首两次是尚未来新加坡之前十一年发动的。而且每隔五年才发动一次，力量微弱。以至一九〇六年来到新加坡之后的五年中，连续发动八次战役，而且一次比一次激烈，激起全国民心，终于在辛亥年（一九一一年）把数千年专政帝制推翻，建立民主共和，创立历史的新页。

孙先生在新加坡这五年中的活动工作，是整个革命过程中关键性最重要的一环。但许多研究孙中山先生历史的人，却忽略了这一环。

孙中山先生来新加坡之前，在日本及欧美各地招会员，能有十几二十位，就很兴奋。他来新加坡成立同盟会，一开始就有十三名参加，由这十三名一下子发展上百名，首次党员大会签名的达二百六十多名。后来发展上千名，会员联络要分区、分帮。这情形在别的城市，是不敢想象的事。

新加坡的会务这样迅速发展，使他非常兴奋。这主要由于会党之支持。他在二十六岁（一八九二）行医时，即加入洪门会致公堂。他的同学尤列早几年来新加坡行医，暗中联络会党的人。新加坡当时是南洋洪门会的联络中心。怡和轩的总理林推迁，即当时洪门最大派系义兴的红棍，义兴这股力量，即热烈支持同盟会。

孙先生如果没有来新加坡，即不能获得这股大力量的支持。来了新加坡，不论人力、钱力，都得到源源的应援。

从最后一次广州战役，当时牺牲了七十二位同志，称七十二烈士。其中三十一位为华侨，十位为新加坡青年。

当时预定的费用要十万元。以当时物价、工资与现在比算，一元等于现在两百元，十万元等于现在的二千万元。当时各属同志汇集新加坡策划筹集，于辛亥一月，英属筹得四万七千元，荷属筹得三万四千元。领导广州战役之黄兴致南洋各同志信中说：“如果没有这些钱，各同志必将散去，革命将无希望。”

孙中山先生在筹款时，曾对同志说，“现在时机，应作破釜沉舟计划，能多筹一分，成功即增加一分。检讨过去失败，是力量不集中。现在需先集齐款项。成功与失败，在我们现在作决定。”

从当时危迫情形，说明成功因素，全在新加坡指挥中心发生作用。广州战役依计划爆发，震惊全国，而促成武昌起义，实现推翻清帝目标。

当时在新加坡更重大的一项影响力，即《中兴日报》与保皇党《天南新报》一场对君主立宪问题的大论战。结果，不但把保皇党打垮，同时借这场论战教育了许多有识之士，了解革命，进而纷纷支持革命。把南洋侨社上、中、下各阶层民众的意识，大部分转移过来。这是了不起的成功。

孙先生在辛亥之前，有三件大事决定了他的成败：

一为“神户蒙难”：那时他二十九岁（一八九五），计划广州起义，事泄失败，逃到神户，被清廷所捕；后得华侨财主金门人王敬祥拯救，得以脱险。日本人后藤著书说：没有王敬祥，就没有孙中山，没有孙中山，就没有中华民国。

二为第二年（一八九六）三十岁的“伦敦蒙难”。那时如果没有得到他老师康德黎医生的搭救，那条命就完了，中国革命事业也完了。这件事他有《伦敦蒙难记》，大家是清楚的。

三为“新加坡发难”：他四十岁（一九〇六）来新加坡，不断发动八次战役，最后达到成功；我们可总称其为“新加坡发难”。

“新加坡发难”也是决定他成败的关键。

这五年可记述的事情太多了。可惜没有人好好地加以搜集与整理；结果，成为空白。

（原载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新加坡《联合早报》）

梅屋敷曾住伟人 今益增光彩

位于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靠近火车站的国父史迹纪念馆及碑亭，经过近一年的整修与重建，已接近完成阶段，只要庭园布置后，就可公开，供国人缅怀。这也是国人对国父孙中山先生一百二十周年诞辰的献礼。

国父与台湾的关系甚为密切，在革命的历程中，国父曾两度来台湾，策划革命大业；其中于民国二年十一月底，国父讨伐袁世凯失败，第二次来台湾，在台北的御成町“梅屋敷”旅舍住了一个多月，这个地方也就是现在的国父史迹纪念馆；在光复后到去年，国父所住的房间陈设，仍旧保持原状，供后人瞻仰；但在今年因地下铁路施工，遂将原址拆掉，迁移到原址北方约五十公尺处重建。

负责监督施工的是交通部台北市区地下铁路工程处，督导工程的胡志鹏工程师指出，地铁处与中国国民党党史会当初在拆迁时即决议，以后“国父史迹纪念馆”重建时，将依原有建筑的形状、材质、面积、型式重建，同时配合扩建一小型庭园，加植松、竹、梅及草皮等，让“国

“国父史迹纪念馆”保持它原有的历史意义。

大门是一中式牌楼，朴实古拙，高五点四米，由两柱巨大的石柱竖起，上方两长块的木板，嵌上蒋公亲笔所题的“国父史迹纪念馆”的匾额，大门给人的感觉，就像国父一生行事光明磊落的风度。

进了大门，右边一栋木造建筑，这是新建的，做为贵宾室及管理员室，所有的格式、质料亦都仿造“梅屋敷”旅舍的原建筑，以求整体的美观。

进大门的正面，由石块矗起的屏风及一迴廊，不致令园里的景色一览无遗，从迴廊向右转，即到了国父当年下榻的旅舍，这栋日式木造建筑物，一瓦、一木都是当年原物，也是“国父史迹纪念馆”重建工程中，费时最多的一个工程。

从玄关上去，整洁亮丽的地板，一尘不染，新糊的窗纸，在光线晃动中，恍惚见到国父的身影；进入大厅，八十个崭新的榻榻米，使这栋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焕发新意，大厅内所有的梁、柱、门、窗、天花板等，都是原有的松木，髹漆与旧建材同样的漆料，流露出木材天然的质感。

胡志鹏工程师说，旧建筑中有些木材已蛀掉，他们都用特别的防腐、防蚁材料处理，有些将蛀的木材，则保持外表原样，内部也特别处理过；其他的陈设也都依照原样。只是四周迴廊的玻璃窗，为防巨风，加了一道木门而已。

这栋建筑最大的特色是外檐屋顶，用铜片覆盖，排水水管也是铜制精品，配合建筑的价值。

胡志鹏指出，重建的建筑本身高度不变，但为衬托这栋建筑的历史意义，将地基加高约一米，以凸显建筑的身份，与新建建筑不同。

在新建“国父史迹纪念馆”庭园的东南方，国父手书“博爱”及蒋公亲题的纪念碑亭巍然耸立，纪念碑亭的支柱，亦采用整条桧木做成，显得古色古香。

以往的“国父史迹纪念馆”只是当年国父下榻旅舍的建筑而已，这次迁建，面积增加到一千坪，除了碑亭及建筑外，其余特别增建一小型的中国庭园，有小桥、木池、迴廊，并植有黑松、金丝竹、葫芦竹、罗汉松，并铺百慕达草皮。由于花木草皮培植不易，加上内部陈设布置还要些时日，因此，党史会等单位决定于明春草长花开的植树节时，再开